



群体·社会丛书
QUNTI SHEHUI CONGSHU

明清知识群体的 专业化与社会变迁

——以史家、儒医、讼师为个案的考察

吴琦 尤学工 冯玉荣 杜维霞 著

明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群体·社会丛书
QUNTI SHEHUI CONGSHU

明清知识群体的 专业化与社会变迁

——以史家、儒医、讼师为个案的考察

吴琦 尤学工 冯玉荣 杜维霞 著

明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知识群体的专业化与社会变迁：以史家、儒医、讼师
为个案的考察/吴琦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10

ISBN 978 - 7 - 5203 - 4969 - 7

I. ①明… II. ①吴… III. ①知识分子—群体—社会
变迁—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D691. 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0029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卢小生
责任编辑 刘芳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8
插页 2
字数 415 千字
定价 1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世知识群体的专业化与社会变迁——以史家、儒医、讼师为中心的考察”（项目号：12JJD770018）终期成果

封面设计：杨蕾

封面制作： 大鵬設計
010-81574849

目 录

第一章 总论	1
第一节 选题说明	2
第二节 明清社会群体的变动趋向	6
一 群体内部的分化与重组不断加剧	6
二 群体之间的互动频繁而剧烈	7
三 社会精英群体向优势区域集中	9
四 群体力量日益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	10
第三节 关于知识群体专业化的诸问题	11
一 “专业化”实指专业化发展趋势	11
二 明清众多职业群体的专业性	12
三 专业化与知识的社会化	13
四 明清知识群体社会参与的近代性	14
第四节 史家、儒医、讼师的专业化表征	15
一 明清史家群体	15
二 明清儒医群体	18
三 明清讼师群体	19
第五节 课题研究说明	21
第二章 明清史家群体及其专业化考察	23
第一节 明清史家群体的基本构成	26
一 受命于朝的史官	27
二 私修史家	39

2 | 明清知识群体的专业化与社会变迁

第二节	史家群体的分化与整合	67
一	史家群体的政治性分化与整合	67
二	史家群体的社会性分化	89
第三节	史家群体的专业化认知	99
一	史学的学术边界与知识体系	100
二	将史学视为专门之学,追求成为“专门史家”	107
三	史学方法的专业化	112
第四节	史家群体与社会变迁	119
一	历史观念的传播与塑造	119
二	历史书写与文化秩序	143
三	清初史家群体的文化秩序诉求和变化	159
四	回归常态的史家群体和文化秩序	170
第三章	明清儒医的医宗典籍编纂及其理想形象	175
第一节	医学的正典化与大众化:明清之际的 儒医与“医宗”	181
一	门户之见、医道不明与医宗之兴	183
二	渡河之筏:崇祯年间的《医宗必读》	190
三	大众化与通俗化:康熙年间的《医宗说约》	196
四	皇权与正典:乾隆年间的《御纂医宗金鉴》	200
第二节	儒道医风:明清医者画像中的理想形象	207
一	明清医者画像	208
二	明清医者像赞	219
三	明清医者画像中的理想形象	226
第四章	明清讼师群体及其专业化考察	236
第一节	健讼与明清讼师的活跃	245
一	健讼之风的盛行及成因	245
二	官方息讼思想的推行	252
三	明清讼师的活跃	263

第二节	明清讼师诉讼活动的专业化倾向·····	278
一	学以致用：明清讼师的专业素养·····	279
二	讼师的诉讼活动及其专业化倾向·····	285
三	讼学文献与讼师技能的专业化·····	295
第三节	讼师社会资源网络的构建·····	308
一	内部整合：讼师间的竞争与联合·····	308
二	外部关系：讼师社会资源网络的构建·····	315
第四节	讼师与讼棍：明清讼师社会形象的塑造·····	340
一	讼师与讼棍：明清讼师的不同影像·····	341
二	打击与召唤：讼师形象的官方塑造·····	349
三	落寞与回归：讼师的精神窘境及职业认同·····	359
第五节	群体、职业与地方社会·····	371
一	讼师对明清诉讼活动的双重影响·····	371
二	讼师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	382
三	讼师专业化与近代司法转型·····	394
结语	·····	404
参考文献	·····	411
后记	·····	440

第一章 总论

本书为“近世知识群体的专业化与社会变迁——以史家、儒医、讼师为中心的考察”，研究的初衷是希望对知识群体开展一个长时段的考察，同时通过分析知识群体在专业化问题上的表现，探索群体的内部变化及其与社会变动的关联。随着研究的开展，课题组发现研究对象在两方面存在值得重视的问题，一是知识群体的专业化问题在明清时期表现得最为集中、最为充分；二是专业化问题在不同的知识群体内，表现的程度、方式等均有较大的差异，在没有对多数个案群体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不宜简单妄下总体的评判。此外，史学研究中关于“近世”^①的概念，系指从北宋或唐宋之际到晚清的一段时间，而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其主要视点则多聚焦于明清两代。因此，本书的研究立足于明清时期，在对史家、儒医、讼师群体的个案分析中，不乏对早期尤其是宋元时期的追述，但主要笔墨在于揭示明清时期中国知识群体的专业化及其相关问题。课题的终期成果以明清两代为时限，以个案群体为主体，题为《明清知识群体的专业化与社会变迁——以史家、儒医、讼师为个案的考察》，虽然与最初的立项有所修改，但契合该项研究的学术取向，并为后续的一步研究留下拓展的空间。

^① “近世”的概念出自日本学术界。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出现了内藤湖南创立的京都学派说，认为唐宋之间的变革是中世向近世的转变。他们把中国含明清之前的中国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古代（原始社会—东汉时期）、中世（秦汉—五代十国）、近世（宋元明清）。当然，所谓古代、中世与近世的概念，都是在同欧洲历史各阶段相比较的前提下而得出的。

第一节 选题说明

明清时期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大社会转型期，社会的变动剧烈而复杂，全面而深刻。这一时期所出现的诸多重要现象、事件、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影响广泛而深远。考察这一转型期的社会变迁，知识群体是其中最为有效的学术视角之一。这个时期由于人口流动频繁，社会交往剧增，人们因利益、地域、身份等因素而形成身份认同，促使人们更多地以群体的形式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层面，群体（包括阶层、集团）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频繁而紧密。知识群体作为社会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也是社会运行、社会变迁的主要推动力量。

“专业化”是一个现代的概念，学术界一直有着广泛的讨论，但并无完全统一的认识。比较有影响的是1948年美国全国教育协会论述专业时指出的专业化的八项标准：属于高度的心智活动，具有特殊的知识领域，受过专门的职业训练，经常不断地在职进修，视工作为终身从事的事业，行业内部自主制定规范标准，以服务社会为最高目的，设有健全的专业组织。^①而按照学术界广泛运用的利伯曼关于“专业化”标准的解释，所谓“专业”，应该满足以下基本条件：范围明确，垄断地从事社会不可缺少的工作；运用高度理智性技术；需要长期的专业教育；从事者个人、集体均具有广泛自律性；在专业自律性的范围内，直接有做出判断、采取行为的责任；非营利，以服务为动机；形成综合性的自治组织；拥有应用方式具体化了的伦理纲领。^②包括其他代表性观点在内的这些认识和相关的界定，都是基于

^①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Division of Field Servic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The Yardstick of Profession*. Washington D. C., NEA, 1948. 转引自陈永明《教师教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0页。

^② 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现代教育学基础》，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42页。

现代的科学发展、学科分类、领域划分、社会分工等提出的。其共性之处在于：运用专门的知识与技能，强调服务理念 and 职业伦理，经过了长期的培养与训练，享有有效的专业自治，拥有一定形式的专业组织或协会，具有服务和责任意识，开展专业研究且具有权威性。无疑，建立在现代社会发展基础之上的这些认识不宜于完全套用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具体研究中，但在认识论上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在审视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明清社会的知识群体变化及其专业化问题时，会发现二者存在相当的契合性。

据此，探讨明清时期的知识群体的专业化，如下方面应该成为重点考察要素：专业知识群体的形成及其知识体系的专业化，知识群体的专业化研究及其社会影响，知识群体的职业状况及其责任意识。

所谓知识群体的专业化，即指知识群体在既有知识体系的基础上，逐渐地集中并致力于某些或某个方面，呈现专业化发展趋向，这种专业化趋向与知识群体的社会化、职业化趋向紧密关联，同时与知识的社会化进程、地域社会的变动、社会阶层的运动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近世知识群体的专业化有别于现代意义的专业群体所包含的现代学科知识体系、公共服务特性等内涵，但却是知识群体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重要环节和过程。

明清时期知识群体的专业化在诸多领域都有较为明显的体现，一系列专业知识群体形成或正在形成，诸如史家、儒医、讼师、琴师、画师、私塾先生等。这些知识群体的专业化程度不一，但趋势已成，且引发社会的相关变动。本书重在个案的深入、系统研究，选择了史家、儒医、讼师三个群体作为知识群体的典型。三个群体各有不同的专业属性，故而论证相对独立，自成体系，旨在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深入探讨知识群体专业化的相关问题，从不同的侧面讨论知识群体专业化以及与此关联的职业化和社会化诸问题，更深刻地揭示不同专业的知识群体在明清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变动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全书仅做整体性的特征梳理和趋势揭示，不开展个案之间的硬性、刻意比较，以避免出现以偏概全。

近世中国社会出现了诸多趋势性变化，尤其是明清两代，由于社

会交流的扩大与交往的频繁，群体辈出。群体之间产生了更为广泛的互动关系，群体与社会紧密关联。其中，知识群体变化最为突出，也最引人瞩目，这与科举制度的持续发展、科举入仕的深入人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与当时整个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密切关联。由此，知识群体（或士人群体，这二者在学术界并无明确的边界，采用哪一个概念主要取决于研究对象的属性趋向）便成为学术界群体研究的重心，学者群集，成果众多。然而，客观而言，这个历史时期的任何一个群体都是我们考察社会变动与发展、社会内部结构性变化的有力视点。

21世纪以来，明清社会群体日渐为学术界所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不少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①近年来，明清社会群体的研究总体呈现以下特点：第一，社会群体研究多集中于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中，说明学术界新的研究力量在新的学术背景之下，力图改变原来只重视个体研究的状况，广泛地关注社会各阶层、各领域中的社会群

^① 对于社会群体的关注与研究，是近年来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新的走向，各学科纷纷从不同的视角考察社会群体。就史学而言，对于社会群体的关注得益于社会史的兴起与发展，得益于诸如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引入，当然也受到了海外汉学研究的直接影响。

社会群体的研究，以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开展得较早，成果较多。早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近代的绅商、绅士、学生、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群体便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研究对象，尤其是对于近代商人群体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题。在社会史“眼光向下”的学术趋向之下，社会群体的研究随之不断扩展，上至官绅，下至市民，乃至大量的社会下层群体、边缘群体，皆被视为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纳入研究者的视野。而对于近代中国的自由职业者群体，诸如律师、会计师、医师等新兴社会群体，学人们更是关爱有加，吸引了更多的目光。

与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研究比较，中国古代史领域的社会群体研究尚显薄弱。成果不多，且不少成果出自于文学艺术领域。不过，在21世纪的这十数年中，明清时期社会群体的研究有了较大的长进，开展得有声有色，出现了不少好的成果，直接以“群体”冠名的诸如柏桦《明清州县官群体》（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董刚《元末明初浙东士大夫群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4年），谭坤《晚明越中曲家群体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晚明江南士人群体研究——以陈子龙交游为中心的考察》（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洪早清《明代阁臣群体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吴琦《明清社会群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蔡明伦《明代言官群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崔志伟《元末明初松江文人群体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等，名称上没有冠以“群体”二字的成果则更多，而相关的学术论文则无以数计。限于篇幅，此不一一列举。

体，许多成果即便仍是对于个体的研究，但却是通过个体关照群体。第二，研究对象相对集中于社会精英群体，如士人群体、官僚群体等，对于这些群体的内部结构、群体认同、整体特征以及社会作用进行了全面而整体的研究。第三，越来越重视对于下层群体、边缘群体的研究，这些原来不被主流学术关注的领域正在逐渐成为主流学术，如性别史中的女性群体研究、胥吏群体研究、流民群体研究、琴人群体研究等，都成为学人们揭示明清社会变迁、社会格局变动的视点。第四，区域社会群体研究成为较为常见的研究路径，人们注意群体的区域性差异，并认识到群体在区域社会中的作用，把群体的研究与区域社会、地方社会结合在一起。

不过，现有的研究尚存较大的拓展空间，尤其是在群体研究的范围和视野等方面，具体而言：其一，专业（或职业）群体和新兴群体的研究不足，对于下层群体、边缘群体以及其他特殊群体虽有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仍有许多没有被学人们关注和研究，这其中有诸如资料的匮乏等客观原因。其二，对于前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学术界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然而以社会群体为切入点，通过探讨群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社会的变动，这一类成果存在不足，其中尤其缺乏对于明清社会群体近代性的分析。其三，大多数注重对单个群体的考察，而疏于揭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及其意义。其四，研究方法相对单一，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引入不足，如心理学理论的缺失使群体研究缺乏心理与心态的分析，进而无法全面认识群体的不同心理、心态造成的一系列社会行为后果；地理学、生态学理论的缺失使得人们鲜有关注群体生存的自然和人文土壤；人类学理论的不足，局限了群体研究的资料范围，并导致体验式研究的缺乏。指出这些不足，并非意指已有的研究存在什么问题，而是意在说明明清社会群体研究尚有不少可拓展的空间。与此同时，还需申明的是本书的研究也无法完全解决上面所谓的不足，仅只在某些方面开展一点有益的研究。

群体研究的最终目标不在于对群体本身的梳理，而在于通过对群体的内部、外部研究，考察社会的动向与变迁，因而，社会群体研究

应该实现群体与社会的双向关照。在明清社会的剧烈变动中，社会群体从价值观念到行为方式、群体的分化与组合，无不透露出大量的社会信息，折射出社会的发展变迁。总体了解和把握明清社会群体的发展动向，将是我们认识明清知识群体专业化的基础。

第二节 明清社会群体的变动趋向

明清社会群体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其中所蕴含的时代信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是希望为后文探讨知识群体专业化问题（尤其是个案的深入研究）做一个背景的理解与铺陈。虽然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群体都有其时代性，但由于明清时期处于前近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段，其发展中的新动向便具有了十分重要而特殊的意义。明清社会群体的新趋向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明清时期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新的群体现象，这些新的群体现象成为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重要表征，当为近代性因素；二是伴随着社会变动，社会群体发生裂变，加剧了群体的内部变化及其与外部环境的互动，群体的社会意义因此具有了新的内涵。这两个方面构成明清社会群体时代性特征，并共同勾勒出了明清社会群体转型的重要轨迹以及社会的演变趋势。

一 群体内部的分化与重组不断加剧

明清时期，社会群体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化巨大，大到王朝的兴衰与鼎革，小到个体命运与价值的变化无常，上到朝廷的持续不断的政治斗争，下到基层社会自主意识与自治功能的不断加强。此外，社会阶层频繁上下流动，以及士商交混，全民逐利，等等。社会环境的持续而不断的巨大变化，无时无刻不在促发群体内部的裂变。当然，所谓的裂变，所谓的分化及重组，并非指外在身份与角色的变化，而主要是指价值观念、思想认识及其所带来的态度、立场等的分裂与变化。例如，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巨变中，士人群体作为一个整体，其分化及重组与社会的变动紧密关联，具有十分典型的社会象征

意义——晚明社会的士人群体中，衍生出了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士人群体，如所谓“东林党”的政治集团和以社团形式出现的复社文人集团；此外，还有以文逐利的士人群体，这个群体介于雅俗之间，实则由雅入俗，成员不在少数，江南尤其集中；而致仕经商的士人群体的成员也不在少数，他们代表着“逐利”的士人趋向；同时，还有致力于实学研究与实践的士人群体，这个群体不仅保留着中国传统士人的核心精神品质，而且具有敏锐的社会洞察力、脚踏实地的学风以及领先于其他士人的科学意识；而这一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群体群星闪烁，虽然他们没有也无法挽明朝于既倒，但他们的思想代表着时代发展的方向，对于中国历史的演进厥功至大，当然，也影响了一个时代。而明清鼎革之际，士人群体又在新的社会变动中进一步裂变，我们可以看到诸如抗清士人群体，他们在明清易代的大舞台上，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事件，将士人的气节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贰臣群体虽然留下了不少的骂名，但贰臣的心态与行为，始终成为学人们透视士人心灵的重要视点；不仕清朝的遗民群体是改朝换代直接造成的特殊士人群体，他们的人生选择既是士人的本质反映，同时又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此外，这一时期的士人群体因社会的剧烈变动和事件的频发，不断地形成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社会群体。社会群体的分化与重组在士人群体中不断地演绎着。

二 群体之间的互动频繁而剧烈

在人类社会的演进中，无时无刻不交织着个体之间、群体之间、集团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人类社会赖以发展和变动的前提条件。然而，在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前夜以及变化的过程之中，尤其是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之中，由于利益关系的错综复杂，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的矛盾与冲突，群体与集团之间的互动关系显得更频繁而剧烈，这是社会重新整合的先兆或过程。

处于前近代的明清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自上而下的国家事务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各级地方政府和地方社会，与此同时，各种地方社会力量也不断崛起，社会分层越来越丰富，各种利益集团越来越繁杂，因而，社会组织、团体与社会运动不断涌现。在这种社会

背景之下，在各种国家事务、地方公共领域以及社会运动中，社会群体介入的力度和深度，远胜以往，社会群体的利益取向也越来越鲜明。常见多个利益群体的分合互动，群体之间的互动频繁而剧烈。而群体的互动往往引领和决定事件的走向和变化格局。

例如，作为在野的政治力量的代表，东林人士以明确的政治立场和利益取向，活跃在晚明社会。可以说，这个士人群体的出现，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内部在这个时期的新动向。他们不仅是新的政治力量的代言人，而且在与朝廷各种势力的互动中，在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中，不断影响晚明时期的政治与社会，并促成了晚明政治发展的新格局。虽然其政治作为限于局部而短暂，但毕竟是传统中国社会地方政治力量的一声呐喊，其意义显而易见。

又如，作为晚明启蒙思潮的代表，王学左派汇集了那个时代的思想精英。他们对于人的价值的发掘，对于主体意识的高扬，并没有停留在书斋和文本上面，而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言传身教，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培养信徒。尤其在民间传播思想的行为，有效地将精英思想与民间知识结合在一起，他们走向乡村，在田间与百姓互动。这种以群体频繁互动的方式完成思想与知识的社会化过程，在中国古代社会当为绝无仅有。

明清时期，国家事务的贯彻与执行多引发各种事件与社会运动，其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利益群体的广泛存在，并有着强烈的利益诉求，不同的群体因利益的驱动，分合无定，以至于政治格局变化多端、纷繁复杂。以作为国家事务的赋税征派为例，各级地方官员、州县胥吏、地方绅衿、普通民众等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在诸多相关的社会运动和事件中，我们可见这些群体剧烈的互动状态。明清时期，各地出现的众多的抗粮、闹漕事件都对地方秩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断促动地方政治格局的变化。

近世中国，社会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信息传递与流播更为迅速，人们的社会参与意识也越来越强烈，同时利益群体也日趋增多和细化。这些，都是促成群体之间频繁而剧烈的互动关系的主要因素。

三 社会精英群体向优势区域集中

中国古代在实行科举选仕之后，政治结构乃至整个社会结构都因此不断发生着变化。在由此而展开的政治与社会资源的争夺与较量中，地区之间的差异逐渐呈现。具有深厚的政治传统、发达的经济水平以及丰富的人文资源的地区，将各种资源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大量人才汇集并沉淀下来，社会精英群体日益壮大，并不断吸引各地精英的云集。这种区域社会精英集中的趋势，在明清时期全面展开，江南地区成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地区。

大概自隋唐开始，长江下游一带便不断显现其区域优势，经济的发展使其成为朝廷的财富之源，区域文化也日益彰显其巨大的发展潜力。及至明代，由于明太祖定鼎南京，整个江南地区作为近畿地区，不仅保持着经济、文化在全国的领先地位，而且形成了颇具特色并十分浓厚的政治氛围。成祖以后，虽然都城迁移北京，作为陪都的南京及其周围地区仍然保持着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先优势，并在中晚明乃至清代的社会变动中，引领天下之先，其影响力辐射全国各地。明清时期江南具有的这种社会地位和区域特性，在社会流动方面带来了两个直接的后果：一是本地区社会精英群体的滋生与壮大，二是吸引其他各地的社会精英会聚于此。例如，明清时期，不少士人长时间滞留于江南，其诸多的著述以及其他成果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

除了江南，在其他地区，在由明至清的社会变动中，同样也不乏类似于江南的情形，如北京、广东等，虽然其内在动因有所区别，且精英的汇聚也没有江南那么茂密，然而，这种趋势在明清时期一直在发展并影响着中国社会。社会精英集中的趋势，使地方社会具有了强烈的地域认同与群体认同，地域性群体逐渐成为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致使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运行空间。这种地方社会格局的形成直接带来了近代区域社会的崛起与区域社会引领下的社会变革。

当然，明清时期出现的乡绅城居化的风潮，与上述社会精英的区域集中趋势相辅相成，也直接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整个社会的变动。